

周国伟／著

二十四史述評



ERSHISI SHI SHUPING

侯德仁 曾文杰／整理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周国伟／著

二十四史述評



ERSHISI SHI SHUPING

侯德仁 曾文杰 整理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四史述评/周国伟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672-2189-5

I. ①二…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二十四史—研究 IV. ①K2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3760 号

- | | |
|------|--------------------------------------|
| 书 名 | 二十四史述评 |
| 著 者 | 周国伟 |
| 整 理 | 侯德仁 曾文杰 |
| 责任编辑 | 金振华 |
| 出版发行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 mm×1 000 mm 1/16 |
| 字 数 | 124 千 |
| 印 张 | 11 |
|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72-2189-5 |
| 定 价 | 29.00 元 |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周国伟教授的家属和柴念东先生邀请我为周国伟教授的《二十四史述评》一书写一篇导读性的文字。我自知学力不逮,难以胜任,然而作为本书的整理者却也难以推辞这样的邀请,只好根据自己对本书的粗浅理解撰写成文,谈一些自己的认识,介绍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内容特点,希望能够对读者阅读此书有所助益。

二十四史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组成,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来被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视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文献资料,同时也被大众视为学习研讨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经典,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还被称为“正史”,既具有代表正统政权的意涵,也有着区别其他各种体裁和史书内容的意味。因而,二十四史自古以来就受到历代学者和政治家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文化地位。当代著名史家来新夏先生曾著文分析了二十四史历来受到重视的原因,他说:“‘正史’历来受到重视,其原因是:一、‘正史’记录的对象是历史上的主要朝代。这些朝代大多是封建正统之所在,相沿具有高于其他史籍的地位。二、‘正史’主要是纪传体。纪传体史籍体型比较完备,记录方面也比较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有涉及,资料也比较丰富。它是便于参考的资料宝库之一。三、‘正史’包括从黄帝起到明末止的漫长历程,彼此只有重叠而无间断,年代衔

接,贯通一气,使人可从中得一通贯的概貌。”^①应该说,来新夏先生的分析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足资参考。

其实,自20世纪以来,许多著名史学家对于二十四史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都有极为明确的认识和精辟的分析。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在讲到“人的专史”的做法时,剖析了二十四史在历史人物记载方面的独特优长,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此后两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了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②1935年,顾颉刚先生则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阐述了二十四史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巨大影响,他说:“‘吾华有五千年之历史!’此国人常作自豪语也。问以史何在?必将曰:二十四史不充栋乎?增以《新元史》为二十五史,不尤富乎?我史之可贵,匪特在其卷帙之繁重,叙述之详明,裁断之有制,又当字字有来历,其所根据之原料可得而勘证,示人以必信焉。”同时,他还认为二十四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治中国史学者之不能舍弃历代正史”,“今人殊不知二十

① 来新夏:《“正史”简述》,载《历史知识》1984年第2期。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①。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则认为二十四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着多元的史学价值,他说:“(有人认为)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的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②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亦高度评价了二十四史的史学价值,认为二十四史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藏,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他说:“历代正史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跟它们采用纪传体表现形式也有很大关系。纪传体是纪、表、志、传体的简称,它本是多种体裁结合的综合体,具有容纳整体的历史表述的特点。……这里说的整体的历史表述,一是指纪、表、志、传所包含的诸多方面,一是指它们在同一部史书中的互相配合。完整的纪传体史书,可以看作是包含有丰富内容和生动表述的‘百科全书’。由于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撰写前朝史的传统,故历代正史前后相衔,浑然成一整体,反映了中华民族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进程和上下五千年历史面貌。它们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藏,也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③顾颉刚也认为二十四史在世界

① 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5-198页。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

③ 瞿林东:《二十六史大辞典·导论》,载戴逸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6页。

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二十四史)这部史书是在两千年里陆陆续续写出来的。如此完整连续的历史资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其中不但记载了我国历代王朝的历史,而且还记述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历史。因此它是一部具有广泛资料价值的历史文库。”^①综上所述,二十四史在中国史学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因而,周国伟教授以二十四史作为研究对象,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通读周国伟教授的《二十四史述评》一书,仔细思考该书的主要内容、学术特点和研究方法,我深感这是一部学有师承、术有专攻,著述内容、特点和方法都颇具特色的学术著作。虽然作者谦虚的将本书称为“二十四史述评”,然而通观全书可知,这其实是一部从文献学角度全面考察二十四部正史的研究性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相信本书的整理出版,必将为二十四史研究添砖加瓦,推动二十四史研究的进步。

接下来,我将从本书的成书背景和内容特点两大方面谈一下我对本书的粗浅认识。

其一,关于《二十四史述评》一书的成书背景,我认为这是一部师承有自、学脉清晰的研究著作。周国伟教授的历史研究乃是师承于著名史学家柴德赓教授。1961年,时为中学教师的周国伟先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柴德赓教授写信,表达了向柴德赓先生学习历史的愿望。令周国伟意想不到的,柴德赓先生不仅很快回信鼓励了他,并和他相约见面。对于第一次和柴德赓先生见面的情形,周国伟印象深刻。他回忆说:“当我第一次

^① 见1998年6月1日《光明日报》。

见面和求教时,柴老师问明了我读过哪些历史古籍和大致了解了我的历史知识水平后指出:要研究历史,必须从目录学入门。作为一个原来学经济而转入学历史者来说,更需如此。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给我,教我仔细阅读。又说要做学问,必须多读书,不可随便乱写文章。书读多了,水到渠成,胸有成竹,自然成文。而读书,必须详校。不校不读,边校边读。因要我首先校读前四史,教我以百衲本为底本校读光绪同文本,并从书架上抽出这些书给我。”从此以后,周国伟就按照柴德赓的指导精心校读史书,并且每周去柴德赓家请教一次,每次师生二人均“相对而坐,纵横论学,且问且答,授业解惑,如坐春风化雨之中,远胜课堂讲课”^①。这是一个多么其乐融融的师徒问学的生动场景啊!根据上述引文可知,周国伟虽不是柴德赓点名册上的学生,但却是他登堂入室受教的弟子。众所周知,柴德赓是著名学术大家陈垣先生的高足,师徒二人均长于历史文献学研究。柴德赓师承陈垣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的深厚功底并予以了发扬光大,在历史文献学和学术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由此可见,从陈垣到柴德赓再到周国伟这一条学脉的学术传承路径是十分清晰的,而周国伟所著的《二十四史述评》与陈垣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以及柴德赓的《史籍举要》之间有着非常清晰的传承轨迹。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先生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过“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这门课程。他为这门课程写的说明是:“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

^① 周国伟:《怀念柴老师》,载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2007年版,第179-180页。

而加以批评。每书举作者之略历,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制,版本之异同,以及后人对此书之批评等等,以为学者读史之先导。”^①这门课程对学生学习历史帮助很大,大受欢迎。1930年上半年,北平师范大学一年级学生柴德赓听了陈垣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期末考试还获得优秀的成绩,陈垣先生在当年6月的课程讲稿的一条批语中记录了此事,他写道:“十九年六月廿五日试卷,师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②柴德赓以其才华和好学深受陈垣先生的器重,自此在陈垣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二十余年,备受青睐,深得陈垣先生学术之真传。柴德赓在师大毕业之后,1936年到辅仁大学任教,曾多年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1955年,他调到江苏师范学院后,又继续讲授这门课程(当时名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选读”),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后来柴先生去世后,他的三位学生将他的手稿和讲义整理成书,定名为《史籍举要》于1982年出版。该书于1987年荣获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一书是对陈垣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继承和发展^③,师承了老师陈垣的学术研究理路和教学精华,并且予以了详细的补充和完善。翻检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目录可知,全书正文为270页,全书按照史书体裁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纪传体类,以二十四史为主要讲述对象,共计162页,占全书的3/5;下编为编年体类、纪事

① 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二》,载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2页。

② 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稿二》页面“批语”,载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4页。

③ 详见陈智超《千古师生情(二)》,载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1-162页,或参见柴念东《史籍举要修订本后记》,载柴德赓《史籍举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80页。

本末类、政书类、传记类、地理类,共计 108 页,占全书的 2/5。由此可见,二十四史实际上是《史籍举要》的主体论述内容。后来,这一传统被周国伟的《二十四史述评》继承了。周国伟的《二十四史述评》专门以二十四史为研究对象,当然是在柴德赓的启发和引导下进行的。我们从前述引文可知,柴德赓与周国伟第一次会面即已告知其以校读前四史为研究入门,治学从目录文献入手的方法,应该说从这时起周国伟即开始了二十四史的学习和研读工作。1970 年柴德赓先生去世,柴夫人将柴德赓所藏的一套老同文本二十四史赠给周国伟。据柴念东先生所言,“‘文革’中,周国伟根据柴德赓生前所传授治学‘门径次第’开始研读这套二十四史,用陈垣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体例着手撰写《二十四史述评》”。然而,当时周国伟根本没有看到柴德赓的《史籍举要》一书,他完全是根据柴先生平时指导和个人研读所得,独立写完了《二十四史述评》的底稿,可见周国伟得到了柴德赓的真传点拨。

以上对周国伟《二十四史述评》成书背景的介绍,为我们描述了一条从《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到《史籍举要》,再到《二十四史述评》的学术传承路径,体现了陈垣、柴德赓、周国伟之间紧密的学脉继承关系。相信读者了解了这样一条清晰的学脉后,对《二十四史述评》一书的渊源、内容和特点将会有更为准确和完整的把握。

其二,关于《二十四史述评》一书的内容特点,概括说来,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术有专攻,文献优长。周国伟教授多年跟随柴德赓先生问学,深得柴先生文献学研究路径之真传,一直专攻于历史文献学研究。是故,周国伟在《二十四史述评》一书中发挥自己的



研究所所长,采用历史文献学研究视角对二十四史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是“给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广大文史爱好者以及有志研读二十四史的人,提供研读的门径和方法,介绍史料的来源和考证,阐述编著的体例和版本,评论学术的价值。”“着重在评论各史得失,论述各书优劣。”(见周国伟《二十四史述评》摘要)大体说来,作者对二十四史的每一部史书都是从作者生平及撰述过程、史料来源考证、编著体例溯源和析辨、版本介绍、参考要籍、学术评论,以及用途和阅读方法等七大方面开展文献学研究的。可以说,全书内容大到宏观的框架结构,小到微观内容的细节论述,很好地彰显了作者极为扎实的文献学研究功底。例如,关于《汉书》的史料来源问题,作者首先指出:“《汉书》的史料来源,可分为两个部分。武帝以前,不但材料大都采自《史记》,连文章也大都抄自《史记》原文,仅做加工整理,增、补、并、添而已。武帝以后史料则采自其父班彪所作后传六十五篇和各家所续《史记》或其他记载。”进而作者对《汉书》对《史记》增、补、并、添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如在增的方面,作者论述道:“增,是采用《史记》原来材料,增加的本传有卷三十四里的《吴芮传》、卷四十里的《王陵传》、卷四十五里的《蒯通传》、《伍被传》,卷五十一里的《路温舒、贾山、枚乘传》,卷五十四里的附李陵传和附苏武传。增加的本纪有《惠帝本纪》。这些都是另增篇目,而材料都采自《史记》。在《史记》中被附入别人传中的,在《汉书》中则被抽出另立一传。如:《蒯通传》,材料采自《史记·张耳·陈余传》及《淮阴侯列传》;《伍被传》,材料采自《史记·淮南王传》。惟《李陵·苏武传》,并非全部采自《史记》,有一部分是班固自增的。”作者对《汉书》史料的来源叙述得面面俱到,而且条分缕析,简直如数家珍,可见作者的文献

学功底之深厚。至于介绍诸书的流传版本,那就似乎更是作者所长了。如《汉书》的版本,作者不仅介绍各个版本所长,而且比较优劣。作者写道:“现存《汉书》最早最古的刻本,要算是北宋景祐本。现在的百衲本,就是采的此种本子。而最通用的本子,则是颜师古注一二〇卷本。而比较好的本子,要算是王先谦《汉书补注》一〇〇卷本(光绪二十六年刊,民国五年上海石印)。此外,尚有颜注及三刘刊误和宋祁校语的殿本,又有无宋祁校语的监本,但都不及北宋景祐本的古和王先谦的佳。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有《汉书》点校本,是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作底本,再参照北宋景祐本、明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及金陵书局本而成。其优点是作了比较成功的校刊,校正了《汉书》的许多误衍讹夺。特别是用了他校的方法,‘不主一体,择善而从’,吸取了各家的考订成果,用功至深。其缺点是,只收了颜注,未收王先谦的补注。其实,王先谦的补注,有好些是远胜于颜师古的原注的,应该收入。即使‘为了简明便于阅读’,也不妨有选择地把王氏补注超过颜氏原注而价值特别大、成果显著的,收入插进去。”这里出现了北宋景祐本、明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监本、百衲本、中华书局本等诸多版本专有名词,一方面开阔了读者阅读《汉书》的文献视野,另一方面也扩充了读者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知识,对读者多有助益。

第二,点面结合,重点突出。这一特点,在《二十四史述评》一书中是十分明显的。所谓的点面结合,是指本书对二十四史的文献学研究,既有对每一部正史编撰背景、体例内容和版本流传情况的独立个案分析,又能兼顾二十四部正史彼此之间联系的整体性。作者在讨论每一部著作时,能够对二十四史进行前后联系、纵横比较,注重阐释相互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



二十四史进行整体性的关照。所谓重点突出,是指作者对二十四部正史的研究有详有略,并非均衡如一,十分注重突出研究重点。有关重点突出这一特点,可以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从全书整体上看,《二十四史述评》重点突出了对前四史的研究,尤其是重点突出了对《史记》的研究。因为作者认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更为重要。因此,对前四史论述更为全面,即按上述七个方面,依次进行述评。而尤以《史记》为重点,论述更为全面深入。以下诸史,则视情况,或减或增,或合或并,概括述评,不完全按此七个方面,依次全面论述。”(见周国伟《二十四史述评》摘要)纵观全书,前四史尤其是《史记》的研究比重是非常突出的。根据二十四史地位之轻重,进行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二是从每一部著作研究的内部结构看,史料来源考证或史料来源和价值都是这部著作的研究重点,其他的部分如作者生平、编著体例、版本介绍、参考要籍等在内容丰富程度和体量上都无法与之比拟。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全面考察一部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就需要对该著作的编撰背景、体裁体例、史料来源、版本流布等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而其中对该著作的史料来源和价值的考察则应该是重中之重,因为史料来源的丰富性、可靠性和学术价值直接影响到一部史著的价值。所以,《二十四史述评》把“史料来源和价值”作为内容讨论的重点,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叙议相兼,娴于考证。《二十四史述评》一书,除了对二十四史的内容、体例、版本、史料来源等作说明性介绍外,还对每部正史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等方面发表了一些较为精要的议论,体现出该书有述有评、叙议相兼的著述特点。该书对于各部正史的学术价值和思想的议论,夹杂于《二十四史述评》一书字

里行间,几乎随处可见,文字或长或短,均体现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例如本书的部分议论:(一)《史记》以“共和”行政纪年,是司马迁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表现。作者认为:“当时厉王残暴,人民起来推翻了他,是正义的行动。而厉王已出奔于彘,不再掌权,‘共和’行政,是推动当时历史前进的人和事,故史公以之纪年,不再以僵死的、名存实亡的厉王纪年,以‘政由谁出’为是,不拘宗法正统观念,这完全是进步的观点。”“‘政由谁出’,就是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名副其实,不要名存实亡;要变革前进,不要正统观念。因此,这是进步的观点。”(见周国伟《二十四史述评》第一章);(二)司马迁笔下的塞侯直不疑的奴才形象,是封建社会才能出现的典型形象。作者认为,这个典型的“乡愿”,旧社会的所谓“忠厚长者”,“只有在那封建统治极端专制,只许俯首听命的社会里,才有这样的奴才相;只有在那不允许明辨是非,而须精于处世技巧的社会里,才有这样的‘乡愿’出现。这实际是对西汉社会的控诉,是对统治者的专制黑暗的揭露。这是以典型的手法,对那典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的揭露和控诉”。(见周国伟《二十四史述评》第一章);(三)魏收因在《魏书》中直言不讳而遭记恨,遂被诋为“好抵阴私”,《二十四史述评》则为其辩诬。书中写道:魏收“既是‘意存实录’,又怎能说是‘好抵阴私’!这大概又是因人废言,致得‘时人恶评’。我亦不以为然。如若后人以此批评而说这是《魏书》的缺点,我倒说这正是《魏书》的优点。”(见周国伟《二十四史述评》第九章)由上述几例议论可以推论,书中蕴含着不少真知灼见的议论。

《二十四史述评》一书中还有不少学术性考证,这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这些考证,或考证作者的生平,或考证史料的来



源,或考证史书文字或史实记载的错讹,或考证著作的版本,内容不一而足,考证方法灵活多样,无不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试以本书对《史记》的若干考证为例来说明:(一)考证《史记》的史实记载错误,如奄息、仲行、鍼虎三良殉葬秦缪公之事的考辨。作者认为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责骂秦缪公“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是不正确的,其实“三良并非迫令殉葬,而是出于其感恩报戴之私,自愿从葬。《正义》注引应劭的话,说得很明白。应劭曰:‘秦缪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这明明是三良生前许诺,死后自履其诺言而自愿从死,并非迫令从葬。古人常有这种‘一诺千金’的愚忠的。曹子建也有诗云:‘秦缪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歿同忧患。’这也和应劭的说法差不多,曹子建总也是有所据的,可为旁证。”这里对三良殉葬的史实进行了辩证,论证了三良乃是自愿而非强迫的殉葬史实,在考证方法上采用了旁证法和诗文证史的方法。

(二)对《史记》时间和地点记载错误的考证。“有把时间弄错的。《秦本纪》曰:‘(武公)十三年……晋灭霍、魏、耿。’而《索隐》按:‘《春秋》鲁闵公元年,《左传》云:“晋灭耿,灭魏,灭霍。”’则是晋灭此三国,是在鲁闵公元年。鲁闵公元年,即秦成公三年,而《秦本纪》书于秦武公十三年,错隔了二十四年。”“有把地点弄错的。《秦本纪》曰:‘孝公元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巴地属秦,非属楚,是把秦地错为楚地了。”这里对《史记·秦本纪》中时间的考证采用的是寻流溯源的考证法,而对巴地属秦非属楚则采用的是地理常识判断法。(三)对《史记》中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的批驳。如对《史记·殷本纪》中简狄吞卵生契,以及《高祖本纪》中

梦神生季的内容记载的考证批驳,作者认为“这的确完全是世俗不经之语”,根本是子虚乌有之辞,而且运用现代医学常识反驳其说:“我们知道,凡胎生动物,必雌雄交媾受精而后孕。即使是低级的胎生动物都如此,何况人是胎生动物中之高级者!即使当时是中国人类早起,尽管生产和文化水平低些,但生理原理当是一样的,岂可吞卵而孕就生契!”“在《高祖本纪》中,更写了很多类似这样不符合实际,经不起思考分析的神奇怪话、世俗不经之类。……这是和上述吞卵生契一样的世俗不经之语,连最起码的生理常识都没有。”(见周国伟《二十四史述评》第一章)上述举例,充分证明了《二十四史述评》一书具有厚重扎实的史学考证基本功,拥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学术价值不容忽视。

以上所述是《二十四史述评》一书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毋庸置疑,该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该书主要侧重于对文献史料来源、体裁体例和版本流布等情况的考察,对二十四史所蕴含的思想性阐释严重不足。再如,该书侧重于对前四史的研究,对于其他二十部正史的论述的丰富性明显不足,对这些著述学术价值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客观地说,这些不足的形成,或受制于自身著述的体例而使然,或受制于资料的不足而使然,因而这些不足根本瑕不掩瑜。对于《二十四史述评》这样一部著成于30多年前的学术著作来说,能够在30年后被整理出版,这本身就说明了该书学术魅力的历史穿透性。我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二十四史的研究助力。

是为序。

侯德仁

2017年8月11日写于苏州石湖之畔

前 记

周国伟(1929—2015),湖南湘乡(现涟源)人。1948 考入中央大学(毕业时为南京大学),师从陈绍闻先生习中国经济学、经济史。1952 年毕业后任教于苏州建工学校、苏州第 39 中学。1978 年后曾在华中理工学院、江苏师范学院讲授文史课程。1982 年调入南京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直至退休。有专著《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

1961 年周国伟先生毛遂自荐,写信给柴德赓教授,愿投于门下研习历史。时柴德赓的日记有记:“周国伟来……在建筑学校教俄语,颇喜读历史,近方读《左传》……观其似尚老实,意亦诚挚,略为指点,读书



1963 年春节

门经次第,遂别去。”后来柴德赓安排周国伟整理陈伯君先生的《双蕉草庐诗词稿》^①,并指导他做陆游《渭南文集》的校注工作。校注稿初毕^②,柴德赓看后有评语“稿甚细致,有些基础,将来着笔时就容易了”。据现在收集的资料,周国伟在柴德赓的指导下开始进行《宋史·食货志》《宋会要》整理工作。“文革”的到

① 刻本,1964 年出版;印本,1987 年出版。

② 第一二卷的校样抄本尚存。